

清末新疆回族的人口分布与地域经济差异

——以新疆各地的乡土志为中心*

刘锦增

清末新疆的回族人口在分布上呈现明显的特征：从地理分布来看，其分布极不均匀，以伊塔道所属的各厅、县居多，喀什噶尔道的回族最少；从性别比例来看，以男性回族人口为主；从回族迁徙地域来看，以关内回族移民为主；从移民特征来看，以政府主导性的回族垦荒移民为主。清末新疆各区域的回族在其经济特征上呈现明显差异：镇迪道、伊塔道的回族以耕种为主，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的回族以经商为主。与陕、甘等地的回族相比，清末新疆的回族人口在空间分布及经济特征上明显不同。

关键词 清末新疆 回族分布 地域经济差异 新疆各地乡土志

作者刘锦增，1990年生，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讲师。地址：太原市坞城路92号，邮编030006。

清代是新疆经济开发的重要时期，各族人民纷纷迁徙新疆，为新疆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回族是新疆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回族移民是清代新疆回族人口的主体。学者对清代新疆回族的研究，集中在来源、① 回族起义、② 回族伊斯兰教、③ 回族文化④等方面，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六百年来西北地区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关系研究”(14JJD770014)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陈华主编《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森林、苏萼等《新疆的回族》，《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马良骏《考证回教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齐清顺《清代新疆“回族”述论》，《喀什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玲《回族形成的过程及其特点》，《新疆社科论坛》1999年第1期；马登杰《地域性迁徙对新疆回族地域分布及文化的影响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

② 参见纪大椿《试论一八六四年新疆农民起义》，《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魏长洪《试论一八九九年新疆回民起义》，《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王平《新疆回族人民抗击阿古柏侵略武装斗争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日]佐口透著、章莹译《1760—1860年新疆回民简况》，《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吴万善、张玉峰《关于评价新疆回族、维吾尔族起义的几个问题》，《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等。

③ 参见谭吴铁《新疆回族伊斯兰教史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岳勇《新疆回族伊斯兰教的宗教人类学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等。

④ 参见冯增烈《略论“回回”文化》，《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马湘云《新疆回族教育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陈国柱《乌鲁木齐回族二十三坊》，《回族研究》1994年第2期；陈国光《清代新疆回民的社会生活》，《新疆地方志》1995年第4期；盖金伟《新疆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昌吉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马成翔《新疆回族民间歌曲研究》，《新疆艺术》2001年第1期等。

对清末新疆回族人口的研究则很少论及。^①关于清末新疆回族人口数量,文献中记载不多,但清末新疆各厅、县所修乡土志中的“户口”、“人类”两项,对当地的回族人口及其情况均有记载。本文将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依据新疆各地的乡土志,对清末新疆各地的回族来源、分布及地域经济差异等问题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清末”是指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

一、乡土志中的清末新疆回族人口及分布

同治、光绪初年,随着新疆起义的爆发和阿古柏的入侵,新疆各地人口锐减。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处,皆系兵燹之余,户口凋敝,田地荒芜,古济招集流民仅数百户,产粮甚少。”^②新疆其他各处也是一片萧条,如孚远县“兵燹以来,民人离散”。^③奇台县回族“在同治三年变乱时,不下三、四千家。同治十年大军进剿,或被官兵搜杀,或逃窜他方,几无唯类”。^④绥来县回族“迄同治初年逆回构乱,则本境之回民已过四、五千矣。至光绪二年克复后,本境回民或被官兵剿杀,或避难于他境,存者不过二、三百余家”。^⑤战乱不仅导致回族人口锐减,乾隆至道光年间所形成的回族人口分布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新疆社会重新走上正轨,经济得以缓慢恢复。到清末时,新疆的回族人口数量增多,并在分布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特征。为便于分析,笔者将新疆各地乡土志中对回族人口数量的统计列表于下。

由表1可知,清末新疆各地的回族分布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地域分布上的不均衡。清末时,新疆各道、厅、县的回族分布有着明显的差异。从各道分布来看:首先是伊塔道。伊塔道所属共计一府、二县、二厅。其中,宁远县有回族4786人,^⑥塔城直隶厅有回族170人,精河直隶厅有回族108人。《绥定县乡土志》并未确切记载回族人数,只说“城乡共户口九千三百四十”,且说“县治回民多而汉民少”。^⑦不过,据此无法得知绥定县的具体回族人口数量。伊犁府也没有确切的回族人数,只是说“汉回缠回共计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余丁口”。据《新疆通志·民族志》载:同治年间,新疆回民起义后,“伊犁回族由6万人,锐减到男2100人,女900人”。^⑧清末时,伊犁府回族人口的具体数量,则无确切记载。由此可知,伊塔道所属的一府、二县、二厅,可确定的回族人口数量为5064人。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绥定县、伊犁府的回族人数无法准确判断。

① 参见盖金伟《近二十年新疆回族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清德宗实录》卷3,光绪元年正月癸亥。

③ 佚名《孚远县乡土志·氏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45页。为节省版面,以下引用该书注释中省去编著者信息。

④ 杨方炽《奇台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65页。

⑤ 杨存蔚《绥来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136页。

⑥ 清代“丁”专指能服赋役的成年男子,“口”指女子及年16岁以下的未成丁(参见袁宝华、翟泰丰主编《中国改革大辞典》,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671页)。然而,清末新疆乡土志中并未严格区分。本文在统计人口数量时,无论原始文献中是用“丁口”,还是用“丁”、“口”,均默认是当时的人口总数。

⑦ 萧然奎《绥定县乡土志·户口》,《新疆乡土志稿》,第357页。

⑧ 《新疆通志·民族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表1 清末新疆各厅县回族人数统计表^①

道	府、厅、县	回族人数
镇迪道	迪化县	“男五千四百八十八丁口，女二千八百丁口”
	阜康县	“回二百九十九户，男六百五十三丁口，女四百八十七丁口”
	孚远县	“男丁七百七十七名，女丁七百三十七名”
	奇台县	“迨光绪初年，全疆肃清，始复渐次聚集，有从关内来者，有从他境来者，统计不过五百余家”
	昌吉县	“男大小一千五百二十丁，女大小一千二百一十一口”
	绥来县	“男大小九百三十八丁，女大小五百四十五口”
	呼图壁县	“本境除土著汉民及川陕流寓外，多新旧汉回，皆自关内西安、河湟来者”
	镇西厅	无回户
	吐鲁番直隶厅	“后本地缠回及汉装回以次复业”
	鄯善县	“汉回亦然，其类来自陕甘”
	哈密直隶厅	“男大小共六百六十八丁，女大小共六百八十一口。此外有由西宁逃窜来此者约有百数十户，奔走贸易，居止无定”
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	“男大小二百三十六丁，女大小一百八十五口”	
伊塔道	伊犁府	“汉回缠回共计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余丁口”
	绥定县	“城乡共户口九千三百四十”
	宁远县	“九百八十余户，男三千三百二十八丁，女一千四百五十八口”
	塔城直隶厅	“五十四户，男丁一百三十名，女丁四十口”
	精河直隶厅	“男大小九十七丁，女大小一十一口”
阿克苏道	温宿府	“男大小一千四百五十二丁，女大小九百六十四口”
	温宿县	“男三百五丁，女大小共二百八十四口”
	拜城县	无回户
	柯坪分县	“回商约十余家”
	焉耆府	“男二千二百余丁，女一千六百余口”
	新平县	无回户
	轮台县	“汉民与回民均系侨寓，为数无多，且往来无定”
	婁羌县	无回户
	库车直隶州	“男一千八百八丁，女一千四百五十二口”
	沙雅县	无回户
乌什直隶厅	“客民有关内小教回，有汉人，有安集延人，小教回多置田产”	

① 说明：(1) 本表以宣统三年新疆行政区划为准，回族人数基本为光绪三十四年的数据；(2) 本表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所编的《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整理而成，所引原文均用双引号标明；(3) 户籍中所计的回族以定居的回族为主，并不包括来往经商的回族。

续表

道	府、厅、县	回族人数
喀什噶尔道	疏勒府	“其英、俄夷商与新疆缠回及关内客回各巨商，则多住疏附县城”
	伽师县	“城关贸易客籍汉回七户”，“男大小十四口，女大小九口”
	疏附县	无回户
	莎车府	“本境土著均缠回，外来客民有汉民，有小教回……均往来贸易”
	蒲犁厅	无回户
	巴楚州	“一十一户，男丁二十九，女口二十一”
	叶城县	回户“男十八丁，女十一口”
	皮山县	无回户
	和阗直隶州	无回户
	洛浦县	无回户
	于阗县	“本境地方简僻，商务本不殷繁。本处缠民不解贸，迁其往来经商者，不过俄属安集延，喀什缠回，关内客回数人而已”
	英吉沙尔厅	无回户

其次为镇迪道。镇迪道所属共计四厅、八县，除镇西厅无回族人口记载外，其余三厅、八县境内均有不少回族。其中，奇台县有回户 500 余家，人数在 2000 人左右。迪化县、阜康县、孚远县、昌吉县、绥来县、哈密直隶厅、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共有回族 16926 人。此外，镇迪道所属的吐鲁番直隶厅、鄯善县也有一些回族，不过人数并不多，文献中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可见，清末镇迪道的回族大概有 20000 人。再次，阿克苏道也有不少回族，主要分布在温宿府、温宿县、焉耆府、库车直隶州四地，共计 10065 人。乌什直隶厅也有回族，人数不多。拜城县、柯坪分县、新平县、轮台县、婁羌县、沙雅县等地以维吾尔族为主，即便有回族，也属往来经商之人，为侨寓，并未在当地定居。因此，阿克苏道的回族在 10065 人以上。^① 喀什噶尔道的回族包括关内回族、安集延回族等。其中，在当地定居的关内回族仅 102 人。此外，还有小部分关内回族、安集延回族在当地经商，属侨寓，人数无法统计。可见，喀什噶尔道的回族最少。

从各府、厅、县的分布来看，清末新疆各地的回族分布也极不均匀，以迪化县最多，有 8288 人，宁远县有 4786 人，焉耆府为 3800 人，库车直隶州为 3260 人，昌吉县为 2731 人，温宿府为 2416 人，奇台县大约有 2000 人，孚远县为 1514 人，绥来县为 1483 人，哈密直隶厅为 1349 人，阜康县为 1140 人，温宿县为 589 人，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为 421 人，塔城直隶厅为 170 人，精河直隶厅为 108 人，巴楚州为 50 人，叶城县为 29 人，伽师县为 23 人。当然清末新疆也有不少府、厅、县内并无回族定居，包括镇迪道所属的镇西厅，阿克苏道所属的拜城县、柯坪分县、新平县、轮台县、婁羌县、沙雅县，喀什噶尔道所属的疏附县、蒲犁厅、皮山县、和阗直隶州、洛浦县、英吉沙尔厅。这些区域内并无定居的回族，但有回族商人在当地经商，不过并未加入当地户籍，属侨寓。

^① 由于阿克苏道乌什直隶厅“客民有关内小教回，有汉人，有安集延人，小教回多置田产”，但无确切的回族人口数量，所以这里使用了“以上”一词。

其二,从性别来看,以男性为主。清末新疆各府、厅、县的回族均以男性为主,从各道所属府、厅、县乡土志中确切的回族人数量记载来看,清末新疆回族共有男性19661人,女性12496人,男性人数为女性人数的1.57倍。其中,镇迪道共计有男性10280人,女性6646人;伊塔道共计有男性3555人,女性1509人;阿克苏道共计有男性5765人,女性4300人;喀什噶尔道共计有男性61人,女性41人。笔者认为,清末新疆各地回族男性多、女性少这一现象,主要由以下因素造成:首先,清末新疆的回族从关内各地到新疆,以垦荒为主要目的,所以初来时以男性为主,携带女眷者并不多;其次,新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少回族为躲避饥荒、战火而来,长途跋涉中留下的男性居多;再次,清末新疆的回族有部分随同左宗棠进疆的军队,他们中很多都留在当地进行垦荒;最后,还有一些关内回族男性为了生计,独自到新疆各处经商,之后逐步在此定居。正是由于上述因素,才使得清末新疆的回族以男性为主。

其三,从地域来源及分布来看,清末新疆的回族以移民为主,主要来自陕西、甘肃等地,还有小部分来自其他区域。这些移民在新疆的地域分布上也呈现一定的特征。清末新疆各府、厅、县的回族以关内为主,多数来自陕、甘等地,且主要分布在北疆各处,正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庚戌,光绪帝谕军机大臣:北疆各地“甘陇客回太众”^①如清末阜康县的回族“自陇右、西宁、狄河迁徙而来者,盖十之七八”^②昌吉县的回族“皆光绪三年承平以后,自陕西及甘肃之西宁、河州先后兵荒逃来”^③呼图壁的回族“皆自关内西安、河湟来者”^④鄯善县“汉回亦然,其类来自陕甘”^⑤库尔喀喇乌苏“查本境回民……询悉陕西籍者居多”^⑥南疆各处也有部分来自关内,不过数量并不多,如温宿府“唯光绪初,有陕西回种,散居本城北关市镇,暨巴什阿瓦堤庄,为数无多”^⑦叶城县回族“有自陕西同州来者,有自甘肃兰州、西宁河州等处来者”^⑧

清末新疆也有少数回族来自云南、四川等地,如云南回族马福兴,被朝廷革职后充军新疆,“杨增新念其同是云南人,赠银令其到三个泉开荒。当时三个泉只有五、六户人家,均为1894年之朝廷钦犯,马福兴便和这里的人一同开荒造田”^⑨阜康县“滋泥泉南泉虎家,他们就是四川回族人,从四川迁到阜康后几辈子都在那里居住”^⑩这部分回族人数量少,主要分布在北疆的各耕作区内,但具体分布特征并不明显。还有一小部分回族是来自安集延,他们以经商为主,主要在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活动,如于阗县“迁其往来经商者,不过俄属安集延,喀什缠回,关内客回数人而已”^⑪

① 《清德宗实录》卷450,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庚戌。

② 巨国柱《阜康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30页。

③ 佚名《昌吉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100—101页。

④ 佚名《呼图壁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157页。

⑤ 陈光炜《鄯善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250页。

⑥ 佚名《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302页。

⑦ 佚名《温宿府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443页。

⑧ 佚名《叶城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644页。

⑨ 邓菁《米泉县回族的来源及分布》,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8年印,第24页。

⑩ 傅宪政《阜康县回族概况》,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页。

⑪ 佚名《于阗县乡土志·实业》,《新疆乡土志稿》,第733页。

由上可知,清末新疆的回族主要由各地迁徙而来,在新疆各道、府、厅、县的分布极不均匀,男、女性别比例也不协调。同时,不同地域来源的回族在新疆的地域分布上也呈现出一定特征。各地回族迁到新疆后,很多在当地定居下来,或从事屯垦,或经商,为新疆的经济开发做出了贡献。

二、清末新疆回族的移民特征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内地与新疆的隔阂进一步消除,越来越多的内地回族进入新疆,参与新疆的开发。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新疆回族主要有以下五种来源。

第一种是被清政府俘获,发配到新疆各处的回族。这种迁徙规模并不大。光绪二十二年(1896),河湟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将俘获的刘四伏部众迁往新疆,据《光绪朝东华录》载,“刘四伏已败窜至和尔罕,经李金良等将首要各逆擒获解省”^①之后被发配到罗布淖尔。光绪二十三年(1897),陶模上奏,“去岁,玉门各营收西宁降回三千余口,经臣电商新疆抚臣饶应祺,陆续解往罗布淖尔,择地安插”。^②后由于罗布淖尔地多呈碱性,连年歉收,不利耕种,清政府将其大部分部众安插到焉耆府,“二十九年经前任刘守嘉德迁抚回于府城外,开都河沿南岸安插”。^③

第二种是为躲避战乱、迫害或饥荒迁往新疆的回族。此类移民多属自发性迁徙,规模不大,分散在北疆各处。陕西回民起义被平定后,左宗棠将部分回族安置在兰州附近的金家崖,后这些回族为躲避迫害,陆续迁到北疆各地。关于这点,沙彦奋调查整理的口述史料可以为证:一位受访者对沙彦奋讲述了其祖辈迁徙的历史“我是陕西临潼人……战争结束后,马生彦在广河,此时马占鳌要投诚,马生彦不得不投诚……最后,被左宗棠安置在兰州附近皋兰的金家艾,是一二十里长的平川,都是水浇地。老人还是没有敢停留,认为那些好地方不可能留给回民,于是他们就继续往东撤,走一路撤了一路,定西、会宁也留了一些。马生彦继续往东走,到宁夏西吉县玉桥的下堡子落脚了……后来,我们大部分人陆续迁到新疆,北疆的每个县都有我们的人。”^④再如米泉县有不少回族在清末为躲避饥荒而逃来。光绪二十年(1894),“青海西宁一带正值荒年,青海南川羊毛沟地方的回民约二十多户,被迫远走新疆,沿途乞讨来到红庙子(今乌鲁木齐),清官吏将其送至米泉三个泉子开荒,并以契约的形式规定每年所收获的粮食上交十二石租米,后来这里逐渐形成了村庄……同年来疆的还有青海红雁湖十多户人,也分在米泉,他们就以青海之红雁湖命名他们所住的村庄,至今仍叫红雁湖”。^⑤光绪二十一年(1895),西宁府有一些回族为躲避灾荒,逃到吉木萨,“他们有400人左右。这批人便在我县六户地、渭户沟等处落脚”。^⑥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00页。

② 陶模《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8《覆陈关内外地方善后情形折》,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史地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582页。

③ 张铤《焉耆乡土志·兵事录》,《新疆乡土志稿》,第491页。

④ 沙彦奋、杨文炯《历史过程与群体记忆——伊犁回族百余年迁徙史的人类学调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⑤ 邓菁《米泉县回族的来源及分布》,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24页。

⑥ 马健《吉木萨尔县回族的今和昔》,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46页。

第三类是在政府的号召下,迁徙到新疆从事屯垦的回族。此类回族移民规模大,构成了清末新疆回族人口的主体。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官员纷纷主张实行移民招垦政策。光绪五年(1879)二月甲辰,光绪皇帝谕军机大臣“并咨行刘锦棠,查明北路迁徙南八城之回众及被裹汉民,尽数遣归开垦,拟于绥来添设屯局,广筹牛籽,兼顾西路。即著左宗棠、恭镛酌度缓急,速筹兴办”。^①新疆各地官府,特别是北疆各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陆续出台移民招垦政策,如文大臣在哈密时,令沙亲王“号召流民开垦播植,以佐军食,远窜者因是渐集”。^②王瑜圃代理新疆巡检时,“尽力招徕,月余得百六十户,皆饥困不自存,瑜圃急请督帅左公赈济老弱,并发耕牛九十九对,籽麦三百一十七石”。^③光绪四年(1878),阜康县知县刘铨“招民开垦”。^④光绪八年(1882),金忠介在收还伊犁后,“招安流民,抚辑善后”。^⑤由于各地官府的号召,一些回族进入北疆耕种。这一阶段的移民规模并不大,不过,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光绪四年十一月甲寅,左宗棠奏“据称北路迪化等处,自克复以来,招来开垦,户口日增”。^⑥

新疆建省后,当地政局愈发稳定,内地与新疆的隔阂也进一步消除,越来越多的内地回族进入新疆,参与新疆的土地开发。光绪十二年(1886),刘锦棠对新疆原有的民屯章程进行修改,颁布了新的《新疆屯垦章程》。章程规定:凡是来新疆的屯垦民户,每户给予土地60亩,并由政府借给籽种粮3石,制办农具银6两,修盖房屋银8两,耕牛2头,合银24两,而“额粮则自第三年时,初年征半,次年全征”。^⑦由于这一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加上此时陕、甘正值动乱,自然灾害不断,人民生存艰难,许多内地回族迁往新疆。据《新疆图志》载“近年关内粮贵,回民由甘肃领票迁徙西来。据哈密营卡所报,每月或三四百人,一二百人,络绎不绝于途。”^⑧

第四类是到新疆经商的回商。此类回族流动性很大,人数难以计算。新疆建省后,随着新疆社会的稳定,陕、甘等处许多回族商人前往新疆经商,足迹遍及新疆各处。如昌吉县右城关有“汉回缠酒饭馆、糖面铺二十余家”。^⑨于阗县的商业“本处缠民不解贸,迁其往来经商者,不过俄属安集延,喀什缠回,关内客回数人而已”。^⑩这些来新疆经商的回族,很多都未入当地户籍,属侨寓,在新疆很多地方都存在这种现象,如昌吉县共有回户573户,除了200余户垦荒的收入户籍外,其余“非贸易工匠,即开店营生”。^⑪阿克苏道所属柯坪分县在《柯坪分县乡土志·人类》中载:回户“无”,在《柯坪分县乡土志·实业》中载:柯坪分县有“回商约十余家”。^⑫当然,也有少数内地回族商人在新疆定居,并取得当地户

① 《清德宗实录》卷88,光绪五年二月甲辰。

② 刘润通《哈密直隶厅乡土志·兵事》,《新疆乡土志稿》,第262页。

③ 佚名《呼图壁乡土志·政绩录》,《新疆乡土志稿》,第155—156页。

④ 巨国柱《阜康县乡土志·政绩录》,《新疆乡土志稿》,第26页。

⑤ 许国桢《伊犁府乡土志·人事类》,《新疆乡土志稿》,第340页。

⑥ 《清德宗实录》卷81,光绪四年十一月甲寅。

⑦ 管守新《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措施》,《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

⑧ 袁大化修,王树楠、王学曾纂《新疆图志》卷104《奏议十四》,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3901页。

⑨ 佚名《昌吉县乡土图志·地理》,《新疆乡土志稿》,第111页。

⑩ 佚名《于阗县乡土志·实业》,《新疆乡土志稿》,第733页。

⑪ 佚名《昌吉县乡土图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101页。

⑫ 潘宗岳《柯坪分县乡土志·实业》,《新疆乡土志稿》,第483页。

籍，在当地继续经商，如在温宿府经商、从事手工业的内地回族就加入当地户籍，据《温宿府乡土志》载：温宿府“工：有汉回泥、木、裁缝、铜铁匠数十家。商：有汉回小商数十百家，京货铺约十家以上，人数均已列入上项户口类”。^①

第五类是回族士兵移民。左宗棠所率领的进疆军队，有不少由陕、甘等地招募而来。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很多回族士兵继续留在当地进行开垦。这部分回族分布在新疆许多地方，据新疆各地的文史资料记载，喀什噶尔、沙雅县、吉木萨、呼图壁县等地均有这类回族，如左宗棠在平定阿古柏叛乱后，将由陕西调来的回族兵团“旌善五旗”留在喀什、沙雅一带进行屯田，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吉木萨，“目前我县的回族，其祖先是清代移民外，在近百年内还有随左宗棠、白彦虎、马仲英、马呈祥等军队入疆，后脱离军界或自动流落在我县的回族官兵及其眷属的后人”。^② 在呼图壁县，“至今，不少回族老人一谈起他们的祖籍都可准确地说出是来自关内某地的，甚至能说清楚他们的祖先是随白彦虎或左宗棠的回族军队来新疆遣散落户的”。^③

哈密地区也留有回族健锐军，据光绪二十六年（1900）哈密陕西寺重建匾记“同治十二年大军西征之时，我关中之人民多有应募健锐军者，随同钦差大帅明春督队出关，驻防哈境，威镇斯地历有年矣，迨至光绪七年善后以来，各军遣撤，凡我健锐军资遣之人涤荷钦宪，矜恤不浅，愿回籍者恩给养亲锱，居此土者安置养身之业，复指光华街空地一方，准修礼拜圣寺一处，以为陕西坊立基之源。”^④ 由此可知，驻哈密“健锐军”裁撤后，其中部分陕西回族定居哈密。

上述回族移民构成了清末新疆回族人口的主要来源。这些回族又可分为政府主导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两种。其中，以政府主导性的回族移民为主。随着不断迁徙，新疆各处的回族人数不断增多，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陶模上奏“新疆各属客土回民甚多”。^⑤ 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新疆各处定居的回族在6万人左右。随着新疆各地回族的增多，在一些回族聚居的区域，回族出资捐修了许多清真寺，并以其祖籍地来命名这些清真寺，如迪化县在清末“建回民清真寺二十一座”。^⑥ 其中，陕西大寺，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当地陕西回民斥资修建；青海寺，同治七年（1868）由当地青海籍回族捐资修建；凤翔寺，光绪十年（1884）由当地凤翔回族修建；邠州寺，宣统二年（1910）由当地邠州回族修建；肃州寺，光绪三年（1877）由当地酒泉回族修建；固原寺，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当地固原回族捐资修建等。^⑦ 绥定县“县治回民多而汉民少，东关有礼拜寺二，南关有礼拜寺二”。^⑧

① 佚名《温宿府乡土志·实业》，《新疆乡土志稿》，第445页。

② 马健《吉木萨尔县回族的今和昔》，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45页。

③ 李长青《呼图壁县回族简况》，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42页。

④ 古鹏《哈密的回族与清真寺》，哈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哈密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印，第50页。

⑤ 陶模《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4《绥来县客回谋变拏获多名地方安谧折》，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史地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484页。

⑥ 佚名《迪化县乡土志·地理》，《新疆乡土志稿》，第14页。

⑦ 参见陈国柱《乌鲁木齐回族二十三坊》，《回族研究》1994年第2期。

⑧ 萧然奎《绥定县乡土志·氏族》，《新疆乡土志稿》，第357页。

三、清末新疆回族经济的地域差异

清末新疆的回族,不仅在人口分布和移民性质上呈现明显的特征,同时其经济特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分布在镇迪道、伊塔道各处的回族,以耕种为主,只有少数侨寓回族以经商为业;分布在阿克苏道和喀什噶尔道的回族,则主要以经商为业,只有少数区域的回族从事耕种。总体来说,清末新疆各地的回族是以屯垦为主,经商者多属侨寓,所占比重并不大。

光绪年间,镇迪道、伊塔道所属各厅、县的回族基本以耕种为主,形成了以农为主的经济特征,如孚远县回族以“耕种营生,安居乐业”。^①昌吉县回族“在城耕种贸易者五百四十四户,其在大军户河州工一带承户耕种者二百余家”。^②哈密直隶厅的回族“务农佣工者三百二十余户”。^③伊犁府的回族以耕种为主,“至于汉、回、缠民,有租地耕种者,有自种业地者”。^④绥定县的回族“是以耕种者有十之八”。^⑤不过,精河直隶厅、绥来县的回族则例外,他们不以耕种为生,以经营工商业为主。镇迪道和伊塔道从事耕种的回族,主要在各垦殖区及其附近居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伊塔道和镇迪道是清末新疆的主要农业垦殖区,居住在这里的回族以开垦为主。当然,由于这里商业贸易较为活跃,不少回族居住在城区,经营各类手工业和商业。镇迪道、伊塔道所属的各厅、县均有回族经商的足迹,如奇台县“客回十之八九散处于古城、木垒及旧县治城关内外,其中贸易者一百三、四十家,作匠者四、五十家”。^⑥昌吉县南关有“汉回缠酒饭馆、糖面铺二十余家”。^⑦伊犁地区也有一些回族从事各类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他如金、银、铜、铁、泥、木、裁缝、制剑诸工艺,以及贩卖零星小本营生者,不胜枚举”。^⑧绥来县和精河直隶厅的回族则以经商为主:绥来县的回族“为商者较多”。^⑨精河直隶厅的回族“耕种者十之一二,贸易者十之八九”。^⑩

清末阿克苏道和喀什噶尔道的回族则形成了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经济特征,只有少数回族在当地从事农业活动。回族善于经商,清末新疆战后,陕、甘等处许多回族又纷纷进入新疆经商,回族经商者遍及新疆南北各处。其中,阿克苏道所属各厅、县的回族在长期经营中形成了以经商为主的经济特色。温宿府“工:有汉回泥、木、裁缝、铜铁匠数十家。商:有汉回小商数十百家”。^⑪柯坪分县有“回商约十余家”。^⑫喀什噶尔道由于地处清朝与中亚、南

① 佚名 《孚远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45页。

② 佚名 《昌吉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87页。

③ 刘润通 《哈密直隶厅乡土志·人户》,《新疆乡土志稿》,第270页。

④ 许国桢 《伊犁府乡土志·人事类》,《新疆乡土志稿》,第343页。

⑤ 萧然奎 《绥定县乡土志·实业》,《新疆乡土志稿》,第360页。

⑥ 杨方炽 《奇台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65页。

⑦ 佚名 《昌吉县乡土志·地理》,《新疆乡土志稿》,第111页。

⑧ 许国桢 《伊犁府乡土志·人事类》,《新疆乡土志稿》,第343页。

⑨ 杨存蔚 《绥来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136页。

⑩ 曹凌汉 《精河直隶厅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425页。

⑪ 佚名 《温宿府乡土志·实业》,《新疆乡土志稿》,第445页。

⑫ 潘宗岳 《柯坪分县乡土志·实业》,《新疆乡土志稿》,第483页。

亚各国的交界，包括安集延回、关内回、俄商等均在此活动。如疏勒府“其英、俄夷商与新疆缠回及关内客回各巨商，则多住疏附县城，盖该城系通商码头，故皆辐辏于彼也”。^①伽师县有“城关贸易客籍汉回七户”。^②莎车府“外来客民有汉民，有小教回……均往来贸易”。^③叶城县回族“在此久则三十余年，近则十余年或四五年不均，均在此小贸营生”。^④于阗县的商业主要掌握在“俄属安集延，喀什缠回，关内客回数人而已”。^⑤不过，回族商人的经营规模很小，商业也并不发达。

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也有小部分回族从事耕种，集中分布在阿克苏道所属的焉耆府和乌什直隶厅，不过整体规模并不大。焉耆府的回族有很大一部分为刘四伏部众，他们在当地耕种，到清末时，焉耆府“现有汉农二十余家，回农四百三十余家，蒙古近来亦知耕种，乌沙克他庄有蒙古六户，前报垦有案”。^⑥乌什直隶厅的“客民有关内小教回，有汉人，有安集延人，小教回多置田产”。^⑦

清末新疆回族经济在地域上呈现明显差异主要是因为社会环境、地理位置、历史因素、政策导向等因素所致。首先，从社会环境和历史因素来看，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的居民以维吾尔族为主，当地土地开发程度较高，土地主要由当地的维吾尔族耕种。乾隆、嘉庆时期，清政府只许内地民人单身前往南疆各城，以避免民族冲突。因此，除了单身商民往返贸易外，在南疆从事农业生产的内地人寥寥无几。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清政府在平定玉素普叛乱后，才废弃南疆携眷之禁，允许内地官兵商民携带家眷，同意和鼓励内地人移民扎根南疆。^⑧此后，南疆的内地人开始增加，一些回族也进入南疆，参与当地的开发，规模并不大。光绪年间，阿克苏道和喀什噶尔道的土地仍主要由当地的维吾尔族耕种，回族所耕种的土地并不多。不过，阿克苏道的维吾尔族并不善于经商，当地手工业和工商业贸易并不发达。内地等回族抓住这一机遇，进入当地，或从事各类手工业，或运来当地所需的各类日用百货、生产用品，换取当地土特产品后，再销往内地。其次，从政策导向来看，伊塔道和镇迪道所辖区域为清代新疆主要农业垦殖区。乾嘉年间，清政府就在此实行移民垦荒策略。新疆建省后，清政府继续在伊塔道、镇迪道实行移民开垦政策。光绪十二年（1886），刘锦棠对新疆原有的民屯章程进行修改，颁布了新的《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内地民众去开垦荒地。此后包括回族在内的大量内地人口进入北疆，积极参与当地的土地开发。他们在北疆的一些重要屯垦区定居，如孚远县“县治南山、广泉子聚居回民”^⑨在此耕种。因此，伊塔道、镇迪道的回族以耕种为主。当然，也有一些内地回族商人进入当地，经营手工业。不过，整体上来说，伊塔道和镇迪道的回族以从事农业为主。最后，从地理位置来看，喀什噶尔道由于地处清王朝与中亚、南亚交通孔道，回族商人、俄商等均在此活动。不过，由于此地经济相对落后，所以商业贸易并不发达，回族商

① 蒋光升 《疏勒府乡土志·实业》，《新疆乡土志稿》，第601页。

② 高生岳 《伽师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608页。

③ 甘曜湘 《莎车府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618页。

④ 佚名 《叶城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644页。

⑤ 佚名 《于阗县乡土志·实业》，《新疆乡土志稿》，第733页。

⑥ 张铤 《焉耆府乡土志·实业》，《新疆乡土志稿》，第494页。

⑦ 佚名 《乌什直隶厅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584页。

⑧ 参见贾建飞 《试论清中期的南疆经略政策——以对内地人的政策为中心》，《欧亚学刊》第5辑，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⑨ 佚名 《孚远县乡土志·人类》，《新疆乡土志稿》，第45页。

人的经营规模很小。正是由于上述诸多方面的因素，才造就了清末新疆回族经济的地域差异。

四、结语

同治、光绪初年的动乱，使新疆各地回族人口锐减，经济萧条。左宗棠收复新疆后，随着新疆政局的稳定，各地回族不断移居新疆，到清末时，新疆的回族人口增多。清末新疆的回族人口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回族在新疆各地的分布极不均匀，这大致也奠定了今天新疆回族的基本分布形态；其二，性别比例不协调，男性约为女性的1.57倍；其三，以关内回族为主，不同地域来源的回族在新疆的地域分布上也呈现出一定特征；其四，以政府主导性的回族移民为主。同时，清末新疆各区域的回族在其经济特征上也呈现明显差异：镇迪道、伊塔道的回族以耕种为主；阿克苏道和喀什噶尔道的回族以经商为业，只有小部分回族从事耕种，集中分布在阿克苏道所属的焉耆府和乌什直隶厅。与陕、甘等地的回族相比，清末新疆的回族在空间分布及经济特征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一，清末新疆的回族并未被迁徙至边远的荒芜山区，而是有的分布在各垦区进行屯垦，有的则居住在各城区进行商贸，这点不同于清末陕、甘、西宁等地的回族分布；其二，总体来说，清末新疆各地的回族以屯垦为主，经商者多属侨寓，所占比重并不大，这一点区别于清末西宁府、宁夏等地的回族经济。

回族是清末新疆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疆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清末新疆的回族对今天新疆回族的分布格局、经济生活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末新疆各地回族的后裔，成为今天新疆回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责任编辑 朱 尖）

· 书 讯 ·

马大正先生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

全书67.2万字，分四篇、十八章。绪论二章，概述统一多民族中国与中国边疆，以及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综论四章，从纵的方向阐述中国边疆研究60余年演进历程，并兼论了20世纪下半叶台湾地区边政研究的持续与嬗变；分论九章，专题综述了60余年来中国边疆研究9个研究重点的研究成果，以期使读者能从纵（综）和横（分）两个视角对中国边疆研究深度和广度有一个总体了解；展论三章，着重评述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突破性发展，阐述中国边疆学构筑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大趋势。

该书有助于读者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研究的发展状况，同时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

Abstracts

Yang Zengxin' s Thoughts and Policies to Govern Xinjiang Yang Shengmin (1)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more than 200 years from the mid-Qing Dynasty to 1949 , although Xinjiang had long faced situation of subversion by foreign enemies such as Russia and Britain , it is difficult for foreign enemies to invade and disrupt Xinjiang' s society if the internal stability is maintained. Historically , the turmoil in Xinjiang mostly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nsification of various conflicts within Xinjiang society , which resulted in social instability , and gave foreign enemies opportunity to invade and eventually led to overall turmoil and even the loss of territ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 – 1949) , the rulers of Xinjiang had been changed many times , among which the 17 years (1912 – 1928) of Yang Zengxin' s rulling in Xinjiang was a relatively stable period of society. It is helpful for us to sum up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by analyzing the policies taken by local governments in Xinjiang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Yang Zengxin Xinjiang Governance Thoughts Governance Policies

The Hui People' s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Xinjiang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Focused on Chorographies of Xinjiang

..... Liu Jinzeng (14)

There were som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about the Hui people' s distribution in Xinjiang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was extremely unbalanced. The majority of the popototion concentrated in the Yita Dao (伊塔道) , and by contrast , the Kashgar Dao lived the least. From the point of sex ratio , it was mainly males. From the point of its source regions of migration , it was mainly the Hui people who came from inside the Jiayuguan. From the point of the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 it was mainly the Hui people who were guided by government to reclamation. There was obvious economic difference for the Hui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Xinji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hui people in Zhendi and Yita were mainly farmers , however , the Hui people in Akzo and Kashgar were mainly businessmen. Compared to the Hui people in Shaanxi and Gansu , the Hui people of Xinjiang in late Qing Dynasty had a big difference in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Xinji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i People Distribution Economic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Chorographies of Xinjiang

A New Research of Duliao General (度辽将军) in the Western Ha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Li Bingquan (25)

Duliao General , a military rank set from the third year of Yuanfeng (元凤) (era of Emperor Zhao) to the third year of Dijie (地节三年) (era of Emperor Xua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 was a temporarily military general rank for battles which can be seen as one of the “varied general titles ” . It was since may in the first year of Yuanping (元平) that the title was transformed into a “registered general” provided with a gold seal and a purple ribbon. When the time came in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 the title Duliao General was re-mentioned in the first year of Jianwu (建武) (era of Emperor Guang Wu) and awarded first in the eighth year of Yongping (era of Emperor Ming) . It was then a general in command of soldiers , provided with a silver seal plus a cyan ribbon , and designated particularly for the “Camp of Duliao General” in Wuyuan (五原) , however it was still a relatively low rank with a salary of only 2 000 Dan millet per year. The setting up of Duliao Generals in the Two Han dynasties were with direct succession , except that the title in the Eastern Han was permanent and appointed particularly for governing “stated alarming forces” in the north , rather than one of the “varied general titles” or “registered” title held concurrently by a junior officer of garrison station in the Western Han. They both played a positive role for the empire security in northern frontier.